

祁韻士集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祁韻士集

清·祁韻士著

劉長海整理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三晉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祁韻士集 / 劉長海整理. —太原: 三晉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457-0657-4

I. ①祁… II. ①劉… III. ①祁韻士 (1753 ~ 1815)
—文集 IV. ①K825.81-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291505 號

祁韻士集

整 理 者: 劉長海

責任編輯: 落馥香 張仲偉

責任印製: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三晉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設南路 21 號

郵 編: 030012

電 話: 0351-4922268 (發行中心)

0351-4956036 (綜合辦)

0351-4922203 (印製部)

E-mail: sj@sxpmg.com

網 址: <http://sjs.sxpmg.com>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承 印 者: 揚州文津閣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張: 39.25

字 數: 650 千字

印 數: 1-2000 冊

版 次: 2014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57-0657-4

定 價: 360.00 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78-7-5457-0657-4



9 787545 706574 >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出版委員會

(按姓氏筆畫排序)

于沛 成崇德 朱誠如
李文海 孟超 馬大正
徐兆仁 陳樺 鄒愛蓮
戴逸

祁韻士集編委會

主 任：任國維

副主任：鞏玉生 王守禎 孫連珠 張明亮

林玉平 杜學文 楊建平 郝鵬鴻

成建文

委 員：郭華榮 張繼紅 傅艷紅 侯成元

劉長海 聶 强 傅惠成 落馥香

總 序

戴 逸

2002年8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11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12月12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迹。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升爲理性之認識，纔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爲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爲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爲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爲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

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煙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羣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了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毀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巨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昆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

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度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度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抄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目，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抄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毀，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

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獲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制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的革命性變化，出現衆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爲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爲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爲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沾溉將來，是所願也。

序

晚清時期，山西壽陽祁氏爲一大文化名門，祁韻士、祁寯藻、祁世長等乃其中翹楚，在學壇、詩壇和書壇，都有響亮名聲。尤其是祁韻士，對於壽陽祁氏文化的形成，曾起到一種奠基性作用。

祁韻士（1751—1815）一生最爲突出的成就，是參與開創了新興的西北史地學。1778年，祁氏中進士，引見改翰林院庶吉士，奉派學習滿文。經過兩年的學習，他熟練地掌握了這門語言，授翰林院編修。1781年，復充武英殿纂修《四庫全書》分校官，次年轉任國史館纂修官，奉旨創立《蒙古回部王公表傳》（亦稱《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祁氏一生得以傳世的學術偉業，遂由此展開。在《鶴皋年譜》中，祁韻士曾記載此書的纂修與他諳習滿文的關係。年譜寫道：“先是，奉旨創立《蒙古王公表傳》，武進管先生干貞纂傳數篇，奉差離館，時無錫相國嵇文恭公爲總裁，知余諳習清文，派令接纂是書。”

《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是有清一代對西北邊疆史地進行系統研究的發軔，被公認爲“19世紀西北邊疆史地學研究的奠基之作”，它集中體現了祁韻士的史學才能。任職史館後，祁氏發揮其兼通滿漢文的特長，另檢任懂蒙古文字的助手等協力，利用各種“抄送旗冊”，特別是內閣大庫所藏的“清字紅本”，將各種滿蒙資料隨閱隨譯，辨別分析，擇要錄出，反復核查，歸類立傳：“每於灰塵坌積中忽有所得，如獲異聞，積累既久，端緒可尋。”關於西北山水地名的釐定，他根據《皇輿全圖》加以統一，譯成提綱；至於王公源流支派，則“核以理藩院所存世譜，訂正勿訛”。經過八年持續艱苦的勞動，終於高質量地完成了這部歷史杰作。在《鶴皋年譜》里，祁韻士曾如實記載和感慨其入手之初時的種種艱難，如“羌無故實，文獻奚徵，雖有抄送旗冊，雜亂糾紛，即人名已難卒讀，無可作據”等等，然由此，也可見其筚路藍縷之功和勉力自許之情。

在編撰《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的過程中，祁韻士留下大量底稿，後經

杰出的史地學者張穆等整理出版，成為有關新疆和西藏等地區具有開拓性的重要史著之一——《皇朝藩部要略》。此書是一部以皇朝“大一統”史觀為指導、大體以時間為序的紀事本末體著作。它分內蒙古、外蒙古喀爾喀部、厄魯特、回部和西藏等幾部分，較為系統地記述了清朝開國至乾隆末年有關各部以王公為中心的歷史大事。據新近學者研究，該書最初，很可能是《蒙古回部王公表傳》中關於各部落總傳的稿本。書中有不少關於蒙古的“總論性文字”，條理清晰，概述性強，頗有學術價值，可惜僅被《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碎片化”摘引。另外，書中所記乾隆年間發生較近的一些大事，也有為同時期其他史書所不載、或所載不詳不確者。如1750年發生的對西藏體制變革具有直接影響的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事件，該書所記就屬較早。當時離事件發生還不到30年，很多當事人尚保留着鮮活記憶，它與後來成書的《清高宗實錄》在記載上有很大出入，而遠較後者真實可信。^①這也是其重要史料價值的一個證明。民國初年時，該書及與之相配套的《皇朝藩部世系表》四卷，實際上成為《清史稿》“藩部表”參引的重要來源。

不僅如此，在歷史編纂上，正如有的學者所強調的，《皇朝藩部要略》和《蒙古回部王公表傳》，還確立了不同於朝貢體系的“藩部體制”，它們“把蒙古、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作為‘國史’書寫，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奠定了中國多民族國家的基礎，並在主權上進一步明確了這些地區的歸屬”^②。

1804年，祁韻士因戶部寶泉局虧銅案發受到牽連，被謫戍伊犁。但官場失意，卻給其邊疆史地研究帶來了實地考察的難得機遇。流放伊犁期間，祁韻士受伊犁將軍松筠之命編纂新疆地志，抱定“倘不足以信今而證古，是無益之書，可以不作”的宗旨，把考證與實地見聞密切結合，編寫了《西陲總統事略》、《西陲要略》和《西域釋地》等書，匯聚了他關於西北

① 參見呂文利著《歷史書寫與藩部政治——〈皇朝藩部要略〉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中相關部分，也可見其論文《乾隆朝西藏體制變革——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事件為中心》，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

② 同上，《歷史書寫與藩部政治》，第280頁。

史地學研究的另一部分成就，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清嘉道時期，由於國家內憂外患加劇，學界興起了一股經世致用思潮，而西北史地學，正可謂乾嘉考據學向經世實學轉向的鮮明標誌。祁韻士和徐松等人，首開西北史地學之風，功不可沒。徐松的史地名著《伊犁總統事略》（後道光賜名為《新疆識略》），當時影響很大，但該書乃是在祁韻士《西陲總統事略》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充和深化而成。前文所提到的張穆，他之所以迅速成長為道光朝杰出的史地學家，也與他受祁寓藻委托、長期校勘祁韻士的史地著作分不開。事實上，張穆那部在清代研究地理最為詳博的著作《蒙古游牧記》，其最初的創作念頭，便產生於校勘《皇朝藩部要略》的過程中，他覺得祁氏此書詳於“編年”、短於“地志”，遂立志補其不足。由此可知，祁韻士在嘉道時期蔚起的西北史地學的學術新潮中，的確居於一種名副其實的先驅地位。

祁韻士率先踏上西北史地學的學術道路，固然有特殊的機遇，但也得益於他生性務實的作風和有志經世的情懷。這從其完成《蒙古回部王公表傳》、進入戶部任職後，能够潛心研究京師漕倉時務，將1799—1800年間有關“清釐漕政”的疏草，有心匯成《己庚編》一冊，可以透見一斑。《己庚編》對於今人了解嘉慶漕弊，仍不乏重要的史料價值。

正因為祁韻士有着樂觀進取、經世務實的人生態度，故其被貶伊犁的萬里戍途，不僅沒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成為其持續觀察途經地志、不斷增長學識的學術考察之旅。祁氏遠戍“時經一百七十余日，路經一萬七百余里，所見山川城堡，名勝古蹟，人物風俗，及塞外烟墩、沙磧一切可異可怖之狀，無不周覽遍歷，繫於心目。每憩息旅舍，隨手疏記，投行篋中”，《萬里行程記》即為這一考察的簡要記錄和歷史見證。不僅如此，祁韻士還且行且吟，寫就了不少精美的詩篇，細心描摹所見風物、記述獨特經歷，傳達復雜心思、抒發豐富情感，後萃集成《濛池行稿》一冊。到達西域後，復作有《西陲竹枝詞》百首，皆能顯示出其杰出高妙的詩歌長才。

多年前，筆者在《清代壽陽祁氏之文化》一文中，曾稱述祁韻士出色的寫景能力和不凡詩藝，對他的詩歌移步換景、清新狀物、情景交融的品格，尤為傾心，同時認為，《西陲竹枝詞》等對西域少數民族風情的描摹，

亦具有跨越時空的文化史價值。今復讀其詩，此類印象和感知更趨深刻。可以不誇張地說，祁韻士的“萬里行吟”詩，稱得上是他除西北史地學著作之外，留給今人的另一類型的珍貴文化遺產。筆者乃山西壽陽祁氏文化的愛好者，既酷愛祁寯藻書法，又欣賞祁韻士詩歌。在祁韻士離世已近 200 年之際，山西祁寯藻研究會同仁潛心編纂《祁韻士集》，將其詩文盡可能匯集并點校出版，實在是我所盼望的美事，也做了一件很有學術文化意義的工作。感念之餘，草此短文，聊以充序，一則紀念祁韻士，二則也表達對於《祁韻士集》編者不辭辛勞的敬佩之情。

黃興濤

2012 年 5 月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整理說明

祁韻士（1751—1815），字鶴皋，又字諧庭，別號筠谿，晚年又號訪山。山西壽陽平舒村人。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十四日生於鳳臺縣學署，時父祁文汪任鳳臺教諭。五歲始識字，六歲入家塾，自幼學習用功，成績優異。二十六歲被山西布政使、著名學者朱珪所器重，二十七歲中舉，二十八歲成進士，引見改翰林院庶吉士，學滿文期滿授編修。三十二歲任國史館纂修官。奉旨創立《蒙古王公表傳》，歷辛“八年而書成”，深受翰林院掌院學士阿桂及稽璜等人誇獎。四十歲補授左春坊右中允，四十一歲改補戶部主事，五十四歲因寶泉局庫虧銅案發被無辜牽連入獄。次年二月發戍伊犁。在戍三年，協助伊犁將軍松筠完成了《伊犁總統事略》十二卷的編纂工作。書成後摘其要撰為《西陲要略》、《西域釋地》，還著有《萬里行程記》、《濛池行稿》（其子祁寯藻分別於道光十六及十七年刊行）。五十八歲期滿回籍。六十歲赴南京為松筠“襄理部務”一年，因氣候不適返鄉。六十一歲時應陝甘總督那彥成聘主講蘭山書院，後那彥成調任直隸總督，祁韻士時六十四歲亦隨那到保定任蓮池書院山長一年許，於嘉慶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卒於蓮池書院任上。享年六十五歲。

祁韻士一生勤於著述，精於邊疆史地研究，遺稿頗多。除上述著述外，還有《皇朝藩部要略》、《皇朝藩部世系表》、《己庚編》（其子祁寯藻分別於道光二十六、二十八年刊行）。另據《鶴皋年譜》載：祁韻士還著有《史書輯要》、《珥筆集》、《袖爽軒文集》、《覆甌詩集》、《筠谿山房試帖》、《訪山隨筆》、《雜錄》。2011年4月，從上海辭書出版社又查錄《覆甌詩稿》一卷，《袖爽軒文稿》三卷，現已錄入本書，其他還未查到傳本。祁韻士邊疆史地著作的刊行，當時不僅在國內引起了巨大影響，在國外也引起了不少專家的注意，沙俄時代漢學家、著名學者比楚林早在1808年就將《西陲要略》譯為俄文。日本史學家內藤虎次郎曾評價祁韻士著《皇朝藩部要略》：“質實、正確，事實上超過魏源《聖武記》、趙翼《皇朝武功記盛》、

《東華錄》和《平定朔漠方略》等書。”現代史學家評論：“祁韻士筭路藍縷、辛勤耕耘，開創了清代私家西北邊疆史地研究的新風，是私家西北邊疆史地研究的奠基人，其學術成就值得重視。”

爲弘揚壽陽祁氏文化，現將祁韻士的傳世作品匯集成《祁韻士集》一書。

內容包括：《萬里行程記》、《濠池行稿》、《西陲要略》、《西陲竹枝詞》、《西域釋地》、《皇朝藩部要略》、《皇朝藩部世系表》、《己庚編》、《平舒山莊六景詩》、《鶴皋年譜》，以上遺作多爲壽陽筠淶山房刻本，此次整理時，均以此刻本爲底本，參照其它刊本，逐一詳核慎校。對個別錯字和模糊不清者徑改，不出校。只有《袖爽軒文稿》、《覆瓿詩稿》是稿本，先請張厚余先生作了點斷，後又請山西大學閻鳳梧教授進行了覆核，編入本書。還附錄了：程春海撰《祁鶴皋墓志銘》、《清史稿列傳·祁韻士》及《山西獻徵》中的《郎中祁鶴皋先生事略》。

在搜集本書資料時，得到了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組、資料中心以及山西省圖書館、山西大學圖書館、上海辭書出版社等單位的大力支持；壽陽縣委、縣政府，在經濟上給予資助。編錄時請友人李元孝、弓有芳、廬佩鈺分篇進行了校對，又請內蒙古大學白拉都格其教授復校了此稿。於二〇一一年四月底呈報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出版組，二〇一二年二月審定後，由三晉出版社出版。謹此特向支持和幫助整理過此書工作的單位和同仁，特別是白拉都格其、張厚余和閻鳳梧三位學者，深表謝意。

限於學識，整理工作中難免有失當之處，敬祈讀者諒解、指正。

編者

二〇一二年五月

凡 例

一、本書所錄之文，均以筠淶山房刻本爲底本，校訂時又參考了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的《叢書集成新編》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本《山右叢書初編》中所錄祁韻士著《萬里行程記》、《西陲要略》、《西域釋地》、《濛池行稿》及《振綺堂叢書》中所收錄祁韻士《己庚編》刻本互校。對有誤之處，擇善而從之。

二、編排順序以原刻時間爲序，《覆瓿詩稿》、《袖爽軒文稿》爲稿本，置於《己庚編》後。《平舒山莊六景詩》雖爲嘉慶十六年刻，但爲詩作，特置於以上各篇後。

三、原文中的古體字、異體字、俗體字、通假字，均按《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整理工作通則》有關規定照原文排錄，極個別的生僻字、避諱字改爲通行繁體正字，不出校記。

四、原文中的避諱字、行草體字，因筆誤所致之錯字、或顛倒之字詞，徑改不注。殘缺或脫落字、無法辨認的字，用虛缺號□表示。衍文徑刪不注。原文有空缺處以方框表示，視上下句文意由編者補齊者加圓括號（）。疑爲錯字者加圓括號，其後之正字加方括號〔〕。句中疑有缺字者，隨文加編者說明。

五、賦、駢文基本以韻脚爲句，少數以文意爲句。文章中引用典籍文字爲概述大意者，不加引號。

六、本書所錄之文，原稿均未斷句、標點，這次編錄時，用逗、頓、句、冒、書名號、引號等加以斷句、標點。

七、書中原有的夾注，用比正文小一號的楷體字表示，亦加以斷句、標點。

八、《皇朝藩部世系表》，原版爲豎排，改爲橫排後排列格式有所變化。

如原豎排版爲“右科爾沁部：天命九年來歸，旗六、爵十七”均排在該部內文之後。此本爲橫排，特把“右”去掉，將“科爾沁部：天命九年來歸、旗六、爵十七”置於該部之文首。原“右郭爾羅斯部：天命九年來歸、旗二、爵三。以上哲里木盟”。因橫排已將各部的稱號置於該部文之首。所以在“以上哲里木盟”前面均將各部名稱列出，以便讀者查閱。其它部亦如此排列。